

---

发展中国家对环境问题态度不温不火，并不是否定其存在，或认为切实开展国际合作，应对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挑战纯属多此一举。这种态度显然源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发展中国家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自然难以对当前环境危机反躬自省，人们应该记住这个道理。即便在一些高速发展的南半球国家，城市化现象可能引发质疑的原因还是随之而来的区域性贫困，而非产业拥挤问题。

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政策的主旨，是维护“地球飞船”的平衡（注：1879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发展与贫困》一书中，将地球比作茫茫太空中的一艘飞船。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地球飞船”概念，呼吁人类可持续利用资源，维持飞船内部平衡。本文作者进一步描述称，飞船有两个舱位，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在头等舱，而发展中国家在二等舱）。这种平衡取决于能否主要在飞船二等舱，即发展中国家有效控制人口、应用新老技术。即便以上措施完全落实落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飞船上也不会只剩一种近乎三等舱的舱位（注：作为实行资源平均分配的一种可能结果）。各舱位保持现有分布不变，政策才可能起到更好效果。毕竟，任一舱位的扩张都要以大幅降低头等舱生活水平为前提。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这也并不现实……

“地球飞船”的乘客们要保环境、求生存，就须在全球祭出重拳，把发展中国家领土大片圈起来，建成“绿色保护区”，防止地球现有土壤、大气和水等自然资源枯竭，以在某种程度上补救那些饱食工业革命红利的国家过度开发和粗放使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环境伤害。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环境破坏负主要责任，却不承担修复环境的主要义务。且不论这道德与否，发展中国家一旦照此施策，就要在发展方式上自缚手脚，而非只是节能降耗。此外，如果以发达国家这种为维系“地球飞船”平衡而生的生态环境政策为准绳大范围搞“一刀切”，就可能让南半球国家沦为环境饱受工业革命之苦的地球居民最后的周末休闲度假地，而这些国家换来的，不过是能自诩修复和保护好了环境，让人得以像卢梭笔下的“幸福野蛮人”般繁衍生息（注：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称，原始社会的野蛮人依靠自然条件就能生存的状态最为幸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经济社

---

会结构并没有深深打上工业革命的烙印，所以在对环境危机表达关切的同时，不能对发达国家制定的政策照单全收，而要加以扬弃。

首先，是拒绝发达国家单纯靠技术发展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主张。考虑到环保政策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包括造成现有秩序固化，任何环保政策的拟定都应在充分调研和知情论证的基础上体现鲜明的政治性。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维护国家特性，同国际社会一道维系“地球飞船”平衡而无须损及自身利益。

其次，是让国际社会通过共促发展，实现环保责任共担。毕竟，生态环境政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

显而易见，没有哪个国家想跟污染沾边。但是，各国都应形成自身发展规划，对自有资源进行自主开发，建立本国环境标准。把一国的优先事项和环境标准在多边或双边层面强加于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实属强人所难。

正因如此，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也在制订生态环境政策的作法令人担忧。该行生态环境学家表示，环境影响已成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判定是否向发展中国家某工业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的重要因素。保护环境不能以损害主权为代价的主张合情合理。生态环境政策应受各国（而非国际地区组织）发展规划统领。

尽管发达国家仍就生态环境政策各执一词，迄今亦未出具确凿有力的相关数据，发展中国家也该就生态环境政策制订发声了。在此刻亮明立场，既能体现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认识，又能展现对国内国际两手发力解决问题的信心。

国家主权是首要考虑。鉴此，任何全球性生态环境政策都不得成为全面或部分干涉一国自主决定其内政合法权利的工具。实际上，这只需在操作层面确保《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明确的各国司法平等原则落实到位即可……同理，主权也不得成为孤立主义和进而逃避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关键是立足本国利益，在参照发达国家制定或实施的各种方案时擦亮眼睛。各国自然亦当履职尽责，不刻意向可能危及“地球飞船”平衡的政策倾斜。